

《跨文化对话》杂志庆祝自己诞生十年,跨文化研究院也庆祝自己诞生二十年。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来总结这一历程呢?从中欧关系史方面来说,这二十年算不了什么,然而倘若我们想到我们的学术委员会主席恩贝托·艾柯的话,这二十年又是至关重要的。他在学院建立之初时说:“《跨文化对话》生逢其时,这是因为,由于全球化,文化的接近使得微小的差异变得可以觉察且相互关联。”正如莱布尼兹已经确认的那样,在探询知识范围内的一种反复、一种万物轮回的冒险时,这些在无限小量中的无限变化反而能够让人期望万物复原(莱布尼兹:《众生复原》)。

更大的变化是,从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以来,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实现的伟大接近中,在涉及大量可能出现的复原的时刻,在这个决定性的、满怀希望但也担负危险的时刻,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今天像三百年前利玛窦和莱布尼兹的时代那样,因其他政策造成充满希望的相遇的失败。因为我们正是从这一双重假设出发的,从人的认识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出发的。这种理论上的矛盾,也出现在作为跨文化实践基础的相互碰撞这一现实中,由于社会、经济和文化的互相接近和互相渗透而更加尖锐了。

第一个假设之后还有第二个假设:互识的假设,尽管表面现象不同,但不是同一种目光、同一种认知模式的无益的重复,而是借互识模式中的变化而实现的更新。

但是,这种互识求助于两种条件:它首先依赖全球化使之成为可能的一些形式,以及它们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后果。在这个问题上,我们比任何时候更依赖